



革命烈士李双双：

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

李双双(1909—1947)，男，又名李发祥，宁夏原陶乐县五堆子乡人。1943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马鸿逵攻占三边地区，三段地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被迫转移。党组织派他回陶乐县担任陶乐县地下党支部书记，开展工作。1947年6月，不幸被捕，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不为所动，后被敌人折磨致死沉尸黄河。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双双烈士雕像。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李双双生于宁夏陶乐县五堆子乡沟湾子村贫苦农民李福华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祖宗几代都不识字，以务农为生。李双双少年时期给地主揽羊，青壮年时期给地主扛活，受尽了剥削和压迫，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和痛苦。蒋、马匪帮对宁夏人民实行了反动

黑暗的统治，常常抓兵要粮使宁夏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穷苦人家“有男必当兵”，李双双这个独生子也不能幸免。为了躲兵，他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告别了父老妻女，背井离乡，于1940年初逃到绥远省三段地(现归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这个地区，在1937年已被八路军解放，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李双双在这里结识了工委负责同志赵会山、王延、王茜等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与熏陶，从1942年起，在三段地工会情报科科长赵会山的领导下，以经商作掩护，来往于吴忠、王太堡、陶乐县等地，为党组织做了一些探听军政情报，传递消息的工作。

李双双热爱共产党，热爱红色政权，决心长期在红色区域居住，为共产党做更多的工作。1944年春，他将妻子张玉英、长女杏杏、次女丑丑迁往三段地三乡一保定居。1945年，由王延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双双入党后，废寝忘食，舍生忘死地为党工作。他以经商贩碱、卖杂货为名，经常赶着两头小毛驴，或者赶着牛车，往来于三段地、查合淖、三边、陶乐之间，拉着碱或百货，携带着宣传品、报纸、信件、宣传教育群众、组织联络群众，探听情报，传递消息，发展党组织。

1947年初，组织决定由李双双担任陶乐县党支部书记，当时，三段地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三段地的党组织也已被

敌人破坏，为了进一步在陶乐开展党的工作，他和全家于1947年3月19日迁回陶乐县二乡二保。

李双双迁回陶乐后，由于人地两熟，工作更为积极活跃。加上他为人正直，爱抱打不平，穷苦人喜喜欢找他商议，请他出主意、想办法，因而和当地的乡、保长结下了冤仇，敌人对他盯得更紧了。但当时敌人还未完全掌握李双双的具体工作情况，怀疑他有共产党“嫌疑”。1947年6月初，伪保长陈光先伙同警察局巡官马兴邦，以“抓兵”为名，将李双双逮去，从沟湾子押到陈家湾子，拘留在陈光先家里。当时，被抓到的“壮丁”均被带到五堆子庙上去验兵，没有验上的老弱病残者被放了回去；被验上的“壮丁”则被押往高仁镇(伪陶乐县县政府所在地)。李双双也被押往高仁镇。

伪县长姜渊亭、民政科王科长见到验兵名册中有李双双的名字后，把伪乡长李生俊臭骂了一顿。姜渊亭说：“据省委来函说李双双在民国三十四年前加入了共产党。他以经商作掩护，刺探军政消息，国军肃清三边，他逃回陶乐避匿。上边让认真查缉，勿令漏网，你们为啥还要验他的兵，回去给我严刑拷打查问！”

李生俊传达了姜渊亭的指示，令陈光先给李双双钉上脚镣。6月19日，陈光先将李双双押至陈家东屋，私设公堂，严刑拷打审问。李双双宁死不屈，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有吐露党组织的点滴情况。陈光先一无所获，恼

羞成怒，亲自将李双双用绳子吊在陈家东屋的大梁上，继续拷打。李双双被打得脊背流血，眼冒金花，但是，他咬紧牙关，一语不发。夜深人静，作恶多端的陈光先疲惫不堪，回上房里睡觉去了，令陈润子等4个甲长看守。陈润子等4人揪花花进行赌博，没有将李双双从绳子上放下来。由于李双双惨遭毒打后伤势严重，加上吊的时间过长，被吊毁牺牲。

6月20日凌晨，陈润子等人发现李双双已毙命，慌了手脚，立即叫起陈光先，陈光先令陈润子等二人用杆子绑上尸体从陈家湾子扔到黄河中。为了制造跳河逃跑被淹死的假象，将李双双的鞋和脚镣放在河岸上。

李双双牺牲后，尸首从陈家湾子漂到查汗坝约十多里，被用草绳拴到岸边。其父李福华及其妻、女闻此噩耗，哭十多里赶到查汗坝河岸，苦苦哀求准予埋葬尸体。伪巡官马兴帮说：“共产党便衣，还埋葬什么尸体！”伪保长陈光先说：“准收尸就打死谁！”令其暴尸数日，尸首被狗撕食，其状惨不忍睹。

李双双牺牲后，留下一双年迈的老人及其弱妻幼女，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宁夏解放后，李双双被定为革命烈士。1951年7月13日，陶乐县人民法院报请宁夏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将杀害革命干部的凶犯陈光先等人进行了判决，判处陈光先死刑，判处李生俊十年徒刑，判处马兴帮五年徒刑。

(据《石嘴山往事》)

刘志丹、谢子长在宁夏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春，冯玉祥为准备中原大战，把甘肃、宁夏的主力部队调到了河南一线。为了控制后方，冯玉祥委任包头的苏雨生为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而招兵买马、扩展地盘，是土匪、军阀共有的本性。土匪出身的苏雨生见有机可乘，认为这正是扩充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便树起大旗，广招兵马，来者不拒。此时，为了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到宁夏打苏雨生的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

由于二人的机智勇敢和默契配合，被苏雨生委以重任。谢子长任苏雨生部第十一旅旅长，刘志丹任第九旅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后提升为第十九团团长。不久，二人就在苏雨生部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大力争取士兵，训练军事干部。苏雨生部许多团以上军官与刘志丹、谢子长相识，他们也愿意借助年轻人有为的刘志丹、谢子长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苏部兵力大增，威震一方。

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与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五团团长王子元相识，王子元比较开明。于是，中共陕北特委和刘志丹、谢子长决定把该团作为兵运的重点，先后派遣共产党员张东蛟、高岗等到该团，秘密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5月，刘志丹、谢子长经与王子元协商，在贺兰县立岗堡成立了一个学兵队，由张东蛟、高岗任学兵队正、副队长。学兵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干部，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积蓄力量。在组建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蛟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中共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等待时机暴动，争取建立党的武装。

苏雨生在宁夏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引起了把持此地的西北军阀的严重不满，于是直接引发了西北军阀与苏雨生部之间的混战，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苏雨生部哪里是西北军阀的对手，一触即溃，四分五裂。刘志丹、谢子长正好借此机会，带领着我党争取来的一部分队伍，包括王子元团的学兵连，转移到甘肃庆阳地区，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搞兵运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但是，刘志丹、谢子长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非凡胆略，一次又一次地打入军阀部队，执着地开展兵运工作，出生入死，不退缩，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本色。

(据《宁夏党史故事》)

银川得名的由来

银川建城以来，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城址几经变迁，城名也屡度更改。自元初设宁夏府路以来，至明、清、中华民国，这里一直被称作宁夏(省、路、镇、卫、道、府、县)城。直至1947年4月，才正式定名银川市。

“银川”作为古地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银川，古地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境内。又《读史方舆记要》载，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仍置银川，五年废为银川城，金为银川寨”。这个银川城和银川寨其实是北宋时期修筑的永乐城，故址也在今银川市境内，但两者所记述的并非一地。由此说来，唐宋时期的“银川”一名，并不是现在银川市。但是，今天的银川古为灵州和朔方属地，史书中常以灵夏、银夏、麟夏这样的地名，泛指今宁夏和陕北地区。这里所称的“夏”指夏州，故址在陕北，但灵夏、银夏地名的频繁出现，说明宁夏、银川地名，与古代地处陕北的夏州、银川等地名有一定的联系，也说明宁夏早就与“银”字彼此相连，密不可分。

宁夏和银川地名，与党项羌族拓跋氏的割据势力也有一定的联系。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灵州失守，成为西夏政权的临时都城。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把统治中心由灵州移至怀远镇，并将怀远镇更名为兴州(今银川市)。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五月，李德明儿子李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夏大统三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史称“西夏”，建都兴庆府(今银川市)，从此银川市有了兴州、兴庆府的名号。因西夏建国的原因，一些文人、官员常以夏州称宁夏，也以银川、银川来隐喻宁夏(今银川市)。

宁夏地方文献上出现“银川”一词，最早在明万历末期。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至四十六年(1618年)，刘敏宽任三边总督，他的《秋日杨楚璞中丞抚临良晤长城关四首》中有“俯览朔岭临河套，遥带银川掘贺兰”之句。当然，直至明后期，仍然没有以“银川”确指镇城，所以镇城之内也没有出现以“银川”命名的情况发生。清代以后，人们开始纷纷看中“银川”一词，并渐渐在宁夏大地上广为使用，又从河西灌区慢慢收缩而具体定位到宁夏银川的一点上，最终完全成为这座古城的别名和代称了。

清康熙年间，“银川”一词的涵义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一个较为含糊的咏景词变为较明确的地名。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宁夏监收水利同知王全臣在《重修汉延渠暗洞》诗中云：“唐徕西绕山麓，汉延绵亘唐之东。……曾闻河源来自天，一曲伏流流几千。或是天公聊小试，暂移馘穴到银川。”在王全臣之后，较早将“银川”直接作为地名来使用的是兵部侍郎通晋。雍正四年(1726年)，通晋奉旨到宁夏主持修凿惠农、昌润二渠。雍正七年(1729年)渠成，他亲自撰写了《惠农渠碑》，碑文开头即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而北……”

乾隆十八年(1753年)，宁夏知府赵本植在府城西门外创办银川书院，这是首次以银川作为宁夏府城的别名来正式命名一个半官方机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纂修的《中卫县志》的《边防考》首称“中卫银川门户”。当时地方上一班官僚士绅、骚人墨客附庸风雅，在诗词文章中频繁引用，使“银川”这一别名、雅号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词汇。

中华民国时期，宁夏省中还出现以银川为名的剧院(银川舞台)、书店(银川书局)等。“银川”之称，已渐渐家喻户晓。

(据《银川党史网》)

西北灾童学校创建始末

1930年前后，西北陕西、甘肃、宁夏及绥远(今属内蒙古)、察哈尔(今属河北)一带及河南中原大地遭受天灾、战乱，民不聊生，无家可归，生计”为状极惨，不但树皮、草根剥食殆尽，即易子而食、折骨而炊之事亦数见不一”，尤其灾区的难民、孤儿等”死伤遍野，尤为可惨”。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慈善团体、慈善人士纷纷设法予以救济，收容灾区的难民、孤儿，其中救助前往北平(今北京)者为数甚多，如时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熊希龄所创办之北平香山慈幼院收容灾区的难民、孤儿等达400余人，西北赈灾救济委员会收容灾区的难民、孤儿等达200余人。然各地慈善团体、慈善人士”不久又因经济困难无法维持，此600余名灾童之生活复将陷入绝境”。

马鸿逵接收灾童至山东泰安

1930年秋，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冯玉祥相继下野，时局转变。时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熊希龄在北平香山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收养了大批灾童，由于经费欠缺，便与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晤商，托其设法帮助。

马福祥遂致电其子，时在山东泰安驻防的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略云：“熊(希龄)老所办慈幼院，以幼童过多，经费困难，嘱为设法。我看挑选10岁以上的男童，经过三数年教养，即可分拨军队，以基于佐属任用；女童亦可分给军官作养女及小军官们为妻。”

马鸿逵接到其父马福祥电报后，经过再三考虑，特于1930年10月底，派所部参议余祖年前往北平接收这批灾童，得到时任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尽力保护，并协助其进行上之顺利”共接收了北平、陕西、甘肃、察哈尔、绥远、河南等省10岁以上、无父母的男女灾童、孤儿500余人(一说470余人，年龄最大者不过十六七岁，最小者仅为七八岁，当时均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患疾病者居多，与街市一般乞丐儿童无异)。

余祖年抵达北平后，首先奉马鸿逵之命，”为灾童各制棉衣一袭，借御严寒”，然后乘火车将灾童运送到山东泰安，安置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部，乃”暂时留养，以便于地方安插后，酌量分遣还籍，俾使骨肉团聚”。

西北灾童学校开学典礼

1931年2月，马鸿逵在其驻军之地山东泰安成立了“形似补习学校”的机构，将这批灾童予以安置，命名为“十五路军西北灾童学校”，随军设校，予以教养。马鸿逵兼任校长，以所部第十五路军少将参议兼政治处处长屈伸为副校长，“专办西北灾童学校事宜，并嘱(屈伸)将灾童如自己儿女看待，妥为教养，俾使将来能自立”。

1931年4月5日，第十五路军西北灾

童学校在山东泰安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参加开学典礼者，除第十五路军官佐外，泰安当地有关机关首长及各级学校师生与男女来宾共五六千人到会。

开学典礼由西北灾童学校副校长屈伸主持，并“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西北灾童学校校长马鸿逵致训词，“大意陈述灾童经过之痛苦外，并以加紧艺术教育，振兴西北工业为勉励”。随后，由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罗震、第三十五师党特特派员魏耀华、绥远赈灾委员会代表赵子南、泰安县委代表商泽之等先后相继发表讲话，“均有极沉痛之演说”。最后，由西北灾童学校学生、灾童代表刘顺致答谢词，并“报告灾区状况。甚为详尽。全场无不落泪”。

西北灾童学校校舍、课程设置及经费

西北灾童学校设立之初，暂借奇泰安第一小学宿舍为校址，聘请教员、教官等，并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两级小学编制办法》，施行完全小学教育，“教学概况均遵照教务会议议决方法办理”。学生除实施军事教育与训练外，“课程专注重农、工、商业……各种纺织机器正陆续购买”。

在体育方面，对学生管理上，将学生编为5队，各队设队长1人，监督学生的团体(集体)生活，以养成良好之纪律。并对学生施以军事训练，又授以国术(武术)，如十路谭腿、太极拳、八卦拳等，以期练就钢铁(强壮)身体，成为健全的国民。在劳作方面，因欲为便利学生做工，养成职业的技能，设有织袜、制鞋、胰皂三科，俾收工读调剂之效，将来学成，对开发西北、振兴西北工业，前途正未可限量也。唯因经费不足，未能积极扩充，但学生已有过半数均能自动制造矣。

据马鸿逵部秘书主任王中忆述：由于西北灾童学校副校长屈伸是没有办过教育的人，没有办学经验，对灾童管教亦多有不妥。时任第十五路军少将秘书处处长冯廷铸建议马鸿逵，对于灾童，不应施

加军事教育，应以慈幼出发，施行教养。并介绍冯有孚到该校充任教师，商同香山慈幼院随来的几位教员，与屈伸力争改革教养方法，并经冯廷铸从旁相助，使学校面貌大为改善。

1931年9月，第十五路军移防河南许昌，西北灾童学校亦随军迁移至河南许昌。

1932年1月，第十五路军又奉命调驻河南信阳一带，西北灾童学校又随军迁移至河南信阳。

因当时河南信阳公共房屋甚为狭窄，且多为军队驻扎，屈伸副校长遂觅定信阳城北门外的子贡祠与信阳城西六七里之贤山贤隐寺二处暂作校址，校内一切床位、桌椅等俱系由学生用黄泥制成。

西北灾童学校成立周年志庆盛况

1932年4月10日，适为西北灾童学校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事先由该校副校长屈伸筹备纪念盛会，通知河南信阳当地各机关、各学校及社会各界与民众代表前来参加。届时表演新剧(话剧)、跳舞(舞蹈)等，以资助兴，情形甚为热烈。

是日适为星期天，细雨蒙蒙，信阳当地各机关、各学校及社会各界来宾与民众代表1000余人到会。

4月10日9时，首先由该校副校长屈伸及各教员带领与会来宾顺序参观学生功课、织袜、制鞋、胰皂等科成绩，“见学生之作文、大楷、小楷、笔记及图画等均有惊人作品，而学生所制之鞋、袜及胰皂较之市面所售产品为尤佳，来宾无不称赞”。

继之，与会来宾参观了学生宿舍及课堂(教室)，见学生宿舍所有床铺一律白被褥、白床单，非常整齐而清洁。课堂(教室)所有桌椅俱系黄泥垒成，多为长方形。学生对待来宾亦非常和悦而有礼貌，其一向之面黄肌瘦者已变为面色红润、强壮体魄，有疾病者亦已恢复健康。

对此，与会来宾感慨道：“该校办理为期仅只一年，能有如此之惊人成绩，在国内实不多见。”

10时，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该校校

长马鸿逵在学校门前空场上检阅全体学生，教官带领学生进行军事操演及各种拳术表演，“观其动作之敏捷、秩序之整肃，虽三五年之训练亦不及此”。

11时，奏军乐，纪念大会开始。行礼如仪毕，首先由该校屈伸副校长报告办校经过。接着，由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第十五路军参谋长罗震、河南信阳县张县长以及来宾代表相继发表恳切的演讲，最后由灾童代表致答谢词。14时，由该校学生表演游艺，有双簧、新剧、滑稽舞及儿童歌舞剧《甘肃小放牛》《麻雀与小孩》《蝴蝶》等节目，直至17时始散会。

西北灾童学校在宁夏的情形

1933年3月，马鸿逵率部赴宁夏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6月，西北灾童学校又随马鸿逵第十五路军自河南信阳迁入宁夏省城(今银川市)。

据1934年在宁夏视察小学教育工作的教育学家金律和调查，西北灾童学校教职员、学生与经费等呈逐年减少之状况。1930年，教职员10人，学生470人，经费30000元。1931年，教职员6人，学生430人，经费30000元。1932年，教职员6人，学生350人，经费23000元。1933年，教职员3人，学生300人，经费16000元。1934年，学生130人，经费130元。

该校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上课时间较少，而注重于工艺的传授。内分鞋工、袜工、毛巾工、毛衣工、书印工、缝纫工及制胰工等，出品并不甚多。该校设备以随军的缘故，并不十分完备。

金律和调查认为：“西北灾童学校经费由第十五路军供给，而第十五路军军费由宁夏省款支拨，那么该校间接也可以说是宁夏省办的一所补习学校了。”

雪农亦认为：“宁夏之西北灾童学校，可称本区社会教育之特色，课程、工学并重，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

综上所述，西北灾童学校除救济了大批灾区灾童外，并随军设学进行教养，从河南到宁夏，至1936年前后，即西北灾童学校开办5年之后，当这批灾童成长为青少年，灾童学校亦随之停办。

(据《宁夏文史资料》)